

---



---

 學術討論
 

---

## 中國的歷史與性別\*

Rebecca E. Karl 著；呂妙芬、許慧琦譯；楊芳燕校訂\*\*

Francesca Bray, 《科技與性別：帝制晚期中國的權力網絡》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Gail Hershatter, 《危險的逸樂：二十世紀上海的妓女與現代性》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本文評論的兩部著作，各自採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討不同歷史時空中的不同議題。Francesca Bray 主要分析她稱之為「婦女科技」(gynotechnics) 在中國帝制晚期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800) 的情形。她倚重對物質文化的解讀，深入探討宋代以降中國社會與政治體系何

---

\* This essay was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77 (Winters 2000): 142-156.

\*\* Rebecca E. Kar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 New York University;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許慧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楊芳燕，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以能長期擁有某種高度的一致性和延續性。相對地，Hershatter 分析的對象則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關於上海妓女的論述。她透過對文本資料的解構式閱讀，試圖瞭解這些論述如何成為中國過渡到「國族」與「現代性」歷史過程的一部分。這兩部著作雖未能完全令人滿意，卻都提出了有趣的方法論議題，並極具說服力地論證性別 (gender) 確實應被納入關於國家、社會、文化的歷史討論之中，同時也提出許多不只對中國研究，也對性別、現代性、科技等議題的研究而言，相當重要的問題。然而，在面對史料的態度上，兩人相當不同。Bray 對其所處理的資料明顯地抱持一種未經反省的、經驗主義式的信任態度，從而賦予「科技」一種缺乏依據的透明性。Hershatter 則不斷地提醒讀者她所處理的史料之晦澀與多義性，然而，這樣的提醒，不禁令人懷疑其解讀是否可信，也使她對自己所提出的許多重要課題，未能進行更深入的討論。<sup>1</sup> 實際上，Bray 應該可從 Hershatter 對史料的批判態度上學習獲益；而 Hershatter 也應向 Bray 學習，多留意物質層面的訊息。本篇評論將討論上述有關方法論上的問題及其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特別是關於這二本著作所共有的歷史視野。底下筆者將先為本評論提供一個定位這兩部著作的共同框架。

## 性別與中國史

最近 20 年來，中國史的性別研究專著和文章，在數量上有突破性發展。這些成果使我們必須揚棄過去中國史研究著重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研究卻對性別視而不見的態度，同時也改變了過去視中國婦女為長期父權體制下的被動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大多數這些新的性別研究，不論其討

---

<sup>1</sup> 這方面已由 Christian Henriot 評論過。她是 Hershatter 批評者中最為人所知者，自己也曾對此主題發表著作。見其論文 “From A Throne of Glory to a Seat of Ignominy: Shanghai Prostitution Revisited (1849~1949),” *Modern China* 22, no. 2 (April 1996): 132-63，以及與前文同樣期刊號數，Hershatter 的回應，“A Response,” 頁 164-69。

論的時代與領域如何，都必須面對一個歷史問題，亦即，如何探討與解釋中國在整個近現代時期，雖然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與經濟的變革，但性別體制在與王朝國家相結盟的情況之下，卻呈現高度的延續性，到了 19 世紀末，則又經歷了一場雖不徹底，卻不可不謂急遽的崩解。或者，讓我轉述中國學者夏曉虹在討論 20 世紀初期，中國菁英份子迅速拋棄延續了 8 個世紀的纏足行徑時，所提的一項評論：「令人困惑之處，不在於由纏足來支撐的性別體制為何沒有早點崩解，而在於 20 世紀之交的短短 10 年內（1898～1908），過去支持纏足的男女菁英與社會上許多纏足的擁護者，幾乎在一夕之間轉變立場，雖然纏足的某些特徵仍獲得重新表述而被吸納入新的國族的社會與政治脈絡當中。」<sup>2</sup>

那麼，對於中國性別體制的這種高度延續性，及其在近代藕斷絲連的歷史，我們當作如何理解，才不致陷入以下的解釋：視中國歷史整體為停滯不前；或視中國婦女為一成不變的被動受害者；或將「西方」（或者更精確地說，19 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視為扮演喚起中國男女自覺的道德與社會的觸媒角色；或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在 20 世紀後半葉將中國婦女從傳統解放出來的革命性勝利？這些解釋，無論單一地或綜合地，過去都曾普遍受到中國史及中國婦女研究者的鍾愛，但現在已被多數史家所摒棄。近年來，尋找新解釋觀點的工作，又因 20 世紀中國性別革命的失敗之普受關注而更形複雜，這樣的發展更導致人們普遍否定先前關於性別革命的宣稱。這種「失敗」與「否定」通常以二種形式與歷史學者遭遇：在實際層面上，1949 年以後理應消失的性別關係與社會文化行為（如嫖妓，兒童新娘，溺女嬰，綁架婦女，過度剝削勞工），在今日的中國社會與政體上又報復性地萌生；在分析層面上，則是中國社會與文化抗拒根本變革的明顯事例。

<sup>2</sup>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頁 16。夏並未將這個拒斥過程描述為一帆風順；然而，如她所言，當中國菁英份子開始對纏足展開批評時，儘管他們的作為並未立即引起大眾實踐者的共鳴，他們仍迅速摒棄這項行徑。

在抗拒上述「歷史停滯論」與「傳統屹立不搖」這兩個概念的同時，關於性別實踐與社會關係的長期延續性的問題，又被擺上檯面討論。在問題意識上，不只要揚棄過去主流的革命自由派典範，同時也催促人們找尋研究中國帝制史及中國性別史的新取徑。目前已有一個普遍為人接受、關於中國性別體制與社會文化架構的解釋模式：兩者之間的連結機制始終具有某種「活潑的彈性」(resilient)。這種活潑彈性的概念，企圖在肯定整個結構或系統的延續與統一之際，仍保有彈性與變動的空間。或者換個說法，這種特性所要揭示的正是一種沒有質變的量變。<sup>3</sup>

關於這種活潑彈性的解釋，眾說紛紜。舉例而言，Hill Gates 在其新著裡，討論中國帝制晚期巨大的經濟與商業擴張，基本上呈現兩種生產模式間的競爭：由朝廷及儒家文化規範所掌控的納貢制 (tributary mode)，以及由大量小生產者所主導的小商品制 (petty commodity mode)。兩種生產模式的競爭雖在體制中激起變化的動力，但沒有任何一方獲得絕對優勢的獨霸地位而取得壓倒性的勝利。Gates 重新建構的主要基點在於，她對性別化的經濟行為的關注，她更指出，歷史研究若專注於國家層級所主導的經濟，將無視於中國近現代經濟擴張與變革乃倚賴地方層級小商品生產而根本改變的事實。雖然這種改變的確總是受到由朝廷背書、強勢的儒家社會文化意涵所吸納、改造、而再生，因而長期以來也總是隱而未顯。但也因此，Gates 透過詳細敘述地方層級小商品生產的性別化特質，能夠在帝制體系明顯的穩定性與持續性中，重新發掘性別與歷史。相反地，高彥頤 (Dorothy Ko) 與曼素恩 (Susan Mann) 分別從晚明與清初的研究，論證中國性別體制做為配合經濟改變的文化規範，擁有鮮明的穩定性，其主要原因在於：菁英婦女參與了保存此延續性的角色，以及新儒家社會階序相關的菁英文化，從未讓婦女對社會或文化現狀提出根本改變的要求。<sup>4</sup>

<sup>3</sup> Bray 是以取代行之已久的「惰性」與「停滯」等觀點的方式來討論「活潑的彈性」(頁 3)。

<sup>4</sup> Hill Gates,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簡言之，目前這些逐漸浮現於歷史學關於「活潑的彈性」的重要討論，可分為兩種立場：強調兩種生產模式彼此相互競爭主導的巨大經濟變革，不彰顯做為意識型態功用的社會文化穩定性；或者，認為在面對經濟變革之際，意識型態的文化穩定性基本上是存在的，並且由菁英份子所支持。這兩類立場並不盡然對立，雖然其著重點有所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此也透露了作者所欲檢視社會的層級、所視為最後的歷史決定因素為何（如 Gates 看重經濟生產者，而 Ko 與 Mann 看重文化菁英生產者與保存者）、及其如何解讀社會文化的意識型態與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等。上述兩類立場的另一差異在於：史家如何運用並處理其所掌握的資料。過去幾乎所有的書寫、生產、傳播都出自菁英男性（只有少數文本出自菁英婦女），到了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的近代，則出現超越以往的眾聲喧嘩，更多中國婦女加入知識生產的行列。當時中國又充斥著許多外來觀察者（傳教士及其他），一些企圖藉著批判與整理以往的社會規範與習俗，來改變中國、使中國更「文明化」的人。

這些在所著重的面向與資料來源的明顯差異，顯示在中國研究的歷史解釋中賦予文化或經濟重要性的眾大分歧。過去十數年來，在性別歷史研究上逐漸累積的整體成果，已重要地重整了我們自認為對中國婦女以及中國史的認識，也提供了許多振奮人心的觀點。

這些從事性別史研究的學者有一共同興趣，即在於尋求如何解釋中國性別體制與帝國政治長期延續性中的變化。在著重斷裂的革命性典範被揚棄後，愈來愈多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無論在中國或世界各地）從各種想得到的視野，例如社會、法律、文化、經濟、思想、物質、庶民大眾以及政治，來思索這種延續性。以下評論的兩本著作，也都屬於這個普遍的學

---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術趨向。

## 性別化的歷史統合性與科技

Francesca Bray 的書採取一貫平易且流暢的寫作方式，集中探討中國帝制晚期的家庭科技，Bray 所理解的「婦女科技」為結合空間、工作、與生產的社會性別體系（頁 4）；科技在文化生產的機制中扮演某種角色，「透過這機制……長期延續性得以可能，特別是在技術系統中運作的方式……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頁 27）Bray 提出的「婦女科技」概念，意指以女性為中心的科技，其用意首在駁斥傳統僅視商品生產與科學發展為科技的狹隘見解（在這方面她長期以來參與 Joseph Needham 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計劃），<sup>5</sup> 代之以一種較平庸、較具物質基礎的家庭實用觀點。如她所言，傳統對科技的看法不僅排除性別、婦女與日常生活，更受到歷史目的論的支配，將中國等非西方科技貶抑到西方進步主流之外的邊緣位置（頁 7-11）。

Bray 對「科技」理論的闡述開始時雖很有幫助，但在整個討論中卻只被當做是一種「文化表述」或「溝通」（頁 367），且被直接透明式地理解。她的書從理論性的闡述轉入三部分的分析，分別為：家居建築與空間；婦女工作，特別是紡織生產工作；以及生育和母職。對於上層婦女而言，生產與母職是可以區分的，亦即元配可能是不經由生產而身為母親。為何作者選擇此三部份來討論，除了因其構成所謂的中國家庭領域外，在書中並未有充分的討論和解釋。<sup>6</sup> 撇開這個問題不談（儘管 Bray 堅稱她並未有意

<sup>5</sup> Joseph Needham,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Bray 負責撰寫其中第 6 卷，第 2 部分，農業 (*Agri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6</sup> 舉例來說，纏足在 Bray 的定義下肯定是項「婦女科技」，而纏足對帝制晚期的婦女而言，是普遍存在卻又留下空白的女性特有的經驗，這樣的空白只能解釋為纏足做為一種經驗，並無法以 Bray 的經驗方法論來瞭解。換言之，因為缺乏有關於纏足

將「家庭」僵固化 (reify)，但的確有此嫌疑。)，在 Bray 討論的這三部份中，最有趣且理論上最開放之處，是她做了一些關鍵的概念性區分。此本有助於使她不至陷入直接從「技術」導出「歷史經驗」的透明性解讀。然而可惜的是，在她這些關鍵的區分之後，又經常因未對歷史經驗做分殊而將此可能性解消掉，而這樣未經分殊的歷史經驗，又被她用來為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做辯解。

在第一部份中，Bray 討論那些中國家居建築理論如何反映了新儒家男女有別的意識型態，而這樣的建築理論主要記載於供實際建造者使用的木匠手冊內。這些理論又在實際建築上 (Bray 斷定從農民到王侯的住宅均具此男女空間區分的一致性) 獲得物質性的驗證。<sup>7</sup> Bray 由此進一步推論，「我們可將中國家庭想像為一部織布機，它把眾多個人的生活編織起來，成為典型的中國社會型態。」(頁 57) 這個家庭「織布機」的意象，應該就是作者在書中副標題所指出的「權力網絡」(fabrics of power) 的一部份。不過，究竟是誰的網絡以及是誰在從事編織，則並不清楚。事實上，我們很可以問，是否可能在類似的家居空間中，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並產生一套與由上而下的文化一致性無關的社會權力關係？或者，換個方式來提問：空間概念上的統一性儘管可以造成民宅與公共建築 (如寺廟與衙門) 在外觀上的相似性，如坐北朝南、被中庭所分隔等，但是其結果，為何不是產生或加強社會權力的階序格局，而是抽象地散播一致的文化經驗？Bray 的詮釋選擇了一致性，似乎有武斷之虞。

因為正如她所指出的，學者對於新儒家關於兩性的空間與區隔家庭領域的主張，實有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新儒家嚴苛地壓制女性，另有人則

足行為的文件，所以它不能夠通過經驗性的「閱讀」，而必須社會性地去解讀它。有關此方面，見 Dorothy Ko, *Footbinding As History* (Los Angele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sup>7</sup> 有鑑於 17 世紀之前的居家建築結構鮮少留存，這種一致性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臆測性的論斷，雖然 Bray 並未在這方面提醒她的讀者。

認為其視女人為男性的互補，共同維繫社會禮儀秩序。這些不同的見解如何在社會經驗中，或在文化的社會生產中被驗證，將會引發對於「統一性」和「文化」意涵的根本質疑，以及歷史延續性到底靠誰來維繫的問題（朝廷似乎只是個現成而不能發揮作用的選擇），這些在該書都未見討論與陳述，有待再探究。事實上這些問題在書末愈見明朗，特別是最後所探討的18世紀社會與階級劃分的部份，無論其來源與現象如何，社會與階級區分的確被視為一種文化經驗，而他們彼此間，歧異處大過一致性。<sup>8</sup>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具有如此差異性的經驗，在Bray經驗主義方法學下卻無法獲得彰顯（對此她應該採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場），正因為其對一致性與延續性之前提的堅持，這些差異便隱沒而未顯。

在第二部份，Bray討論了婦女工作的社會意義在中國帝制晚期的更迭：婦女紡織從一個公認的重要經濟生產形式，即其所織之布將以實物繳稅朝廷，到隨著賦稅制度的改變（從課徵實物到課徵銀兩），而成為負責家庭生計存活卻隱晦不彰的貢獻者。許多文獻對上述轉變已有充份說明，也廣為人知。然而，Bray有意對這段眾人熟悉的故事營造出饒富興味的敘述，她主要是透過分析從晚明到清之際，「女工」之意涵在「婦女勞動」(women's work)與「女性的工作」(womanly work)之間經歷重大的改變。Bray的分析相當有幫助，她說婦女勞動是「在市場經濟架構內的私有家庭經濟層級

<sup>8</sup> 對此一區別的注意，有助於解釋18世紀之後性別論述及其行為的發展。但是Bray將其研究時限斷在18世紀末，因為她認為19世紀可見「西方經濟與政治侵略的大規模影響…充斥著西方的觀點」（頁2），此一斷章取義的作法，讓我們很難評估到底過去的社會文化分野如何崩潰，又如何在西方衝擊下改變方向。換言之，Bray將其研究斷限在「西方衝擊前」的時間點上，可以保留中國文化一致性觀點，避免觸及此種一致性消散的關鍵的19世紀，使人質疑其所宣稱的文化一致性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過。這類圍堵策略似乎常出現在中國性別史研究上；目前有許多探討帝制晚期中國與五四之後的性別研究，但19世紀的研究卻明顯缺乏，此與想避開「衝擊」的問題有關。此種發展造成了涇渭分明的區隔：一個是受限制的中國（西方衝擊前），另一個是現代已覺醒或覺醒中的中國，而介於其中的是整個被丟置一旁的混亂的19世紀。

內被操作」(頁 256)，或者可說，其在經濟與文化方面都有社會價值。相對地，「女性的工作」，則「屬於道德家與官員們對『女工』的利用，這些人視女性工作為道德行為，此道德行為不僅與性別認同相關，而且以紡織的形式具現。」(頁 256) 換言之，這是在被剝奪經濟生產意義後，被文化意識型態所賦予的價值。關於此，值得注意的是，編織、紡紗、紡織生產等實際活動並沒有改變，然而「女工」的意涵卻分化為一指有變化的、有生產力的勞動，另一則主要是文化意義上延續的活動。正如 Bray 的結論：

婦女生產能力的消逝，或至少是她們曾被承認的生產能力的消逝，似確實使人們越來越強調妻子生產繁衍的角色……甚至我們發現這些發展可能導出一種觀點，認為婦女只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而這種看法至少在一般庶民之間可能產生對女兒、甚至妻子的負面態度。(頁 254)

此處對兩種類型的「女工」所做的區分，同時存在於「婦女」與「工作」的社會意義裡（或至少是朝廷所賦予的社會意涵）；而這兩方面的社會意義，不論合而觀之或者分而論之，都是就歷史過程中社會力量為「婦女」與「工作」二詞所建構的關係而言的。

此處提供的意見是：與其如 Bray 般專注於從實際的經濟行為轉移到後來官僚與道德家們的論述，並從其中解讀出一個統合的文化標準（這裡其實主要是兩種不同的領域，當然彼此互相聯繫），我們實可展開不同的思考，如這些非上層婦女的勞動生產 (*women's work*)，如何在主要以上層婦女為訴求的「女性的工作」(*womanly work*) 的文化召喚下，更趨隱晦而不彰，如此便可汲引出更深刻的理論性及經驗性的討論，說明「文化」與「科技」，無論在經濟與意識型態上，是如何被區分而非被合併或統一，進而討論在清朝年間產生的文化主義的觀點。此一文化主義自然與過去有著連續關係，但也許更值得考慮的是，它是新王朝（由非正統的滿族所領導）為求鞏固根基，對過去的再發明。從此觀點，「婦女」與「工作」基本上是分離的，既被社會內部階級、也被彼此的社會意涵所分離，因而「女性的

「工作」成為道德與上層婦女的理想象徵，而「勞動婦女」則成為下層婦女不被承認的生產任務。「婦女」這個在文化想像上被統合的辭彙，因而瓦解，被階級與意識型態所劃分。<sup>9</sup> 這種劃分既非整齊乾淨，亦非清楚可讀，但在複雜的討論後，將有助於解釋無論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分歧的社會面向與權力運作的經驗。然而 Bray 由於鎖定織布機的事實性與可讀性，也就是專注在技術層面上，便已預先排除這種分析的可能性。

Bray 書的最後一部份是關於生育與母職，特別強調上層菁英家庭元配妻子乃其夫眾妾所生之子的母親。在新儒家的家族體制中，禮法上只容許一妻，而出自不同母親的小孩均被承認為子嗣。因此妾室所生的子女被接受為家族的成員，但妾本身卻不然。在這套制度下，正妻不盡然為生身母親，卻可以是眾多非己出之小孩的社會性母親，如此也貶低了生產的絕對價值，並提昇上層階級中社會性／道德母職的絕對價值。同理可知，在非菁英的中下層家庭裡，由於貧困而無以娶妾，生產（特別是那些要傳宗接代並留在生身家庭裡的兒子）因而愈顯重要，也使發生在菁英社會裡的生理與社會性母職分開的情形難以出現，而將這些中下層婦女緊緊綁在生育的角色中。此書這部份呈現許多關於婦科醫學的精彩洞見以及關於女性身體的「科技」，這方面傅樂詩（Charlotte Furth）的新書則提供了更多細節與理論性說明，<sup>10</sup> 不過 Bray 在這部份也更清楚暴露其在解釋歷史時，重視政治文化的延續性大過社會分工的問題。另外，此書的一大問題是上述三個主要部份似乎各自獨立性。亦即，三部份彼此間缺乏良好的聯繫，只能說其展現的是在歷史動態（或辯證的）形式中的建築空間、「工作」及再生產／母職的過程，而非成功地交待三者的關係。也許如 Bray 在其結論中所言，「科技只有在產生社會的或認識論上的斷裂時，才是有趣而成功

<sup>9</sup> 如曼素恩的著作探討了清王朝（17世紀中期到1911年，特別著重18世紀）時期的經典復興如何有助於對元配地位的重新定義，並將名妓（菁英勞動女）邊緣化。見其 *Precious Records*.

<sup>10</sup>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的……其實，投入在延續和統合的動力並不會比投入革新的動力少，其所要求的解釋也同樣精細。」（頁 370）當然這不並意謂斷裂與分工應全被排除忽略，也不代表科技只應被視為文化整體（作為一種不被問題化的「溝通」形式），而忽略其社會性的斷裂與分殊。甚而，當我們能理解「妻子角色」的再現如何被用來粉飾「妻子貢獻的實際本質與範圍」的變化（頁 371），但若那些非正室妻子（名妓，女兒，妾室）也被納入分析範疇內，或當階級與經濟成為文化分析的解釋中心，而非只是偶發現象時，歷史解釋將有何等的不同？最後，當我們注意到菁英份子對婦女道德典範的要求與社會中大部份婦女必須工作的事實之間所呈現的距離，我們對於「延續性」和「一致性」這對概念將會重新思考，成為更具辯證性的「國家－社會」關係論，以說明透過加強性的文化主義（*a reinforced culturalism*）而非假定的文化統一性，所產生的文化與政治的分化現象。此也顯示對延續性的重視，與之前對變遷和斷裂的強調，其實同樣武斷，充滿目的論的意味。

### 妓女的論述與實踐

Gail Hershatter 的著作鎖定晚清、民國、毛澤東與後毛澤東時期，約為整個 20 世紀，透過對具侷限性的論述及改變極大的上海妓女活動之考察，勾勒出一個社會經濟瓦解、政治動盪不安、文化缺乏穩定的遽變局面，以呈現出中國走向「現代」與「國族」的變遷。這部嘔心瀝血之作，在主題上同時也是近來學術界廣泛研究妓女、<sup>11</sup> 近代上海、<sup>12</sup> 以及有關中國現代性與國族關係<sup>13</sup> 等議題的一部份。Hershatter 並未於其書中明示此書與這些

<sup>11</sup> 有助於進一步瞭解，見 Timothy J. Gilfoyle, "Review Essay: Prostitutes in History: From Parables of Pornography to Metaphors of Moder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no. 1 (February 1999): 117-41.

<sup>12</sup> 最近研究者包括魏斐德 (Fredric Wakeman)；葉文心 (Wen-hsin Yeh)；李歐梵 (Leo Ou-fan Lee)，與 Elizabeth Perry。

<sup>13</sup> 最近研究者包括 Lisa Rofel；唐小兵 (Xiaobing Tang)；Rebecca Karl。

領域的重疊性，反倒是較明確地將該書置於文本研究的範疇中，並主要在發掘文本中的「不諧調」之處（頁 19）。因此「妓女」對 Hershatter 來說，最重要是扮演意符（signifier）的角色，而不是在轉變中的全球或國家經濟環境中一種被問題化的勞動或工作。事實上，她是如此強調與物質性（materiality）的區分，讓此書經常留予讀者一種強烈的印象：「妓女」，「現代性」與「國族」主要都是建構意義的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而非實際的社會過程。介於意符與實際物質間的分離，基本上是人為的，對此任何稍有認知的史家都清楚，Hershatter 更是清楚地認知到，當這種分離做為一種方法論上的主張以維持啟發性和展開辯證性時，所能發揮的效果最好；然而，當論述與象徵化完全取代歷史過程時，這種區隔將變為僵固（reification）與純粹的抽象。很可惜地，在 Hershatter 這部巨作中，有傾向後者的趨勢。試觀 Hershatter 在其緒論「認知與回憶」裡所言：

對妓女、性慾、婚姻與公共衛生的辯論，與對中國現代性的意義密不可分，而此現代性又將過去視為半殖民主義……但此乃是在半殖民都市空間內所進行的關於現代性的內部對話（頁 7-8）。

這些辯論同時也必然與勞工地位、工作、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上海「半殖民」的脈絡中的討論緊密關連。而後述這些議題並不比前述的辯論更不觸及「現代性」的問題。事實上，沒有理由重視更具文化關懷的「現代性」課題，而輕忽勞工、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對於文化的辯論，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乃其結構性的需要，如果沒有由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半殖民狀態」的中國所引起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矛盾，特別是上海半殖民情勢的微觀顯影，不會存在對「現代性」本質的疑問。簡言之，將現代性（及國族）抽離出資本主義的全球脈絡及資本主義展現為帝國主義的中國脈絡——其中勞動與工作是最明確的表意實踐，但也絕對是實質的社會轉變過程——是將現代性置於互相對立的文化論述領域中，並幾乎與孕育其生的全球化領域完全脫節。

所有這些並非意謂文本上的問題不夠真實，它的確是真實而重要的。以 Hershatter 的書言，正如她竭力引證討論的，大多數有關妓女的文本是由男性菁英顧客所寫，他們要不是歌頌妓女們的翩翩丰采，就是惋嘆過去優良精緻的名妓文化在現代的妓女行業中已衰落。有些文本則出自菁英女性社會改革者之手，她們視妓女的存在為病態，並企圖以更具資產階級觀點的工作與家庭觀（也許與 Bray 所討論的「女性的工作」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此處是在新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架構下，而非對帝制新儒家體制的再鞏固。）之名來消滅之。另外，關於妓女的文本也出自西方傳教士之手，他們視妓女的存在是中國「落後」的鐵證，顯示出中國過去的積習；或出自男性民族主義領袖，他們矛盾地認為妓女行業既是中國發展現代性的象徵，同時又是中國國家與種族失敗之表徵；或出自警察，他們選擇性地為妓女定罪；或出自小說作者，他們為妓女行業加上許多特異的色彩。面對如此繁多且觀點經常互相對立的再現，以及由這些再現所呈現出的知識生產之豐富，Hershatter 確實提出了適切的問題：「如果我們強調那些人（妓女）被建構為與他者（有時是不同類的他者）對立的低位階者（*subalterns*），將會如何？」

在提出文本問題的緒論之後，接下來的一章處理了有關妓女的分類與計算問題，之後該書主要以四大部份進行討論：「逸樂」、「危險」、「干涉」與「當代的對話」，每部份都處理了關於妓女論述架構中的一種面向，每部份也都兼顧主題性與編年順序，對議題的不同層面進行層層重疊的探索。然而，Hershatter 對再現問題的整體處理角度，在於討論即使在明顯的社會與經濟變革之際，延續性如何能被製造或加諸於變革之上。

「逸樂」部份介紹妓女如何被組織：透過鬆散的層級，藉由嫖客的期望，對於實際行為的理解，以及追溯妓女做為職業的一種選擇等方法被組織。有關上海都市空間、現代性、與妓女活動的關係，不斷地被提出。Hershatter 做出數項有關「都市」及其做為概念性空間與社會行為場域的建議性評論，然而這些建議始終在強調男性做為文本製造者的脈絡中提出，

說明男性對女體的製造與凝視，以及如何透過被功能性定位的女體來學習都市化。舉例來說，Hershatter 在對嫖客的期望與行為的討論（第 5 章），解讀 20 世紀早期由菁英作家所寫的名妓指南，指出這些指南的寫作目的或實際用途是，提供剛從外地抵滬或社會層級剛昇到可以光顧名妓的那些人（男性）的都市活動的一般指南。總之，她認為名妓「被（這些指南）定位為都市人情世故知識的載體（as bodies of knowledge about urban sophistication）」（頁 131），在同一章的稍後，她又說這些指南實際上是「對都市環境危險之警訊」（頁 141）。在前一種觀點中，「身體」的潛在多重意涵（以 Hershatter 對語言的敏感度，她不可能沒有意會），卻因她認為由男性顧客所生產與消費的「妓女／都市性」的再現是危險的，而完全被扼殺。此處為何不轉而討論做為勞動身體的「身體」，以及這種勞動與都市建構的關係？或在被資本主義與工作間變動的關係所形塑的矛盾現代性之脈絡下，討論 20 世紀早期做為都市化現代城市的上海？討論勞動的主體性如何在上海城市的現代性中被建構，這主體性又關係著妓女／名妓的矛盾形象。<sup>14</sup> 忽略上述問題似乎喪失了超越論述／文本議題以外，可進一步探索解釋或說明現代性中的主要問題（problems in modernity），而僅止於談論某些關於現代性的問題（problems of modernity）。

其實整本書中，有許多地方觸及上海的婦女與工作間逐漸形成的關係。也許僅指出妓女是萌芽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的商品（或就像 Hershatter 擴展此觀點，指出做為商品的名妓被用來做為其他商品的廣告宣傳之用〔頁 168〕），是過於簡略，若能分析做為商品化勞動的現代意義的「工作」（work）本身如何進入現代性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性別關係的辯論中，也許可增加此研究的複雜與深度。也就是說，工作這個概念（如 Bray 熟練地在她討論前近代脈絡的著作裡提出的）本身是可被問題化的。顯然，妓女為錢而工作，是存在久遠的事實，但是在轉變為都

---

<sup>14</sup> 探討這類議題的研究成果，可見 Kathi Weeks, *Constituting Feminist Subjec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緒論及第 4 章。

市薪資工作的現代脈絡下（上海又是 1949 年前中國在這方面的代表），一般評論家與倡導現代化人士對妓女的勞動始終認為是個問題，<sup>15</sup> 妓女從未被看做是單純的勞工，透過妓女的具體形象來展現「工作」與「勞動」間的矛盾複雜關係，將是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而在 Hershatter 的書裡，這仍只是個想法。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Hershatter 的確提及上海婦女勞動的重疊市場（在紡織工廠、性交易〔以其無以數計的形式〕、火柴工廠、家庭女傭等），說明婦女的買賣「……與各類婦女勞動的相關和重疊市場緊密相關。」（頁 193）她也注意到妓女與其他形式的工作間的互相滲透性（頁 193），然而，上述關於「工作」的問題，在其結論部份（是全書較弱的部份）並未能深入討論，只說了一些像婦女被殘忍的拉皮條客運到上海（此視妓女為須受黨或國拯救的受害者，成為改良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標準論述），或婦女多半是迫於生活艱困不得不淪落為娼的故事，亦即，僅觸及「再現」的問題而已。

Hershatter 的書結束在當代中國，此時對於妓女行業的再興有著強烈的辯論，辯論的框架也的確有她所指出的道德口吻和再現的性質。她評論道：

……我並不認為妓女是「真正的」勞動，也不認為所有（拒絕稱妓女為一種勞動形式的）中國評論家是受到假意識的遮蔽。我的用意毋寧是希望觀察人們選擇及拒斥的方式，並詢問這些選擇為什麼會被做出（頁 392）。

然而，假若我們認真看待今日中國大規模妓女行業的復甦，將發現它就像

<sup>15</sup> 很明顯地，此同時呈現了前近代評論家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在資本主義與勞工對抗的脈絡下注意到現代辯論的情境，則這方面的觀察歧異性很大。Timothy Gilfoyle 在其刊於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的文章（前已引）中提及：「對現代的重視忽略了長期以來妓女結構性特徵的重要延續性。」（頁 137）這樣的論點，微之於妓女課題被許多晚近作家劃歸論述的與文化的範疇，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妓女」與「現代性」確有連結討論的必要，並非妓女在近代階段之前不存在，而是因為當我們論及資本主義與勞工時，有關妓女的工作及其行為便會導致很不一樣的歷史問題意識。

1920 與 1930 年代的爆炸性成長一般，多少與現代性有關聯，而妓女行業的興盛本身也與商品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論過去和現在是多麼不完全）有關，因此不論中國評論家的看法如何，「勞動」都是一個適當的分析範疇。簡言之，此處的重點並不在於探究中國評論家們究竟是否對於經濟與社會資本主義重建之影響完全盲目。但毫無疑問地，他們對女性不平等地位（對此，他們仍認為並非時下轉變環境中的產物，而相信是封建主義的餘毒）以及中國缺乏現代性（或應更恰當地被理解為中國在國內及全球方面非常不一致的現代化）的觀點中仍包含許多事實，因此沒有理由不以「勞動」做為討論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核心範疇，並且應同時運用經濟的，以及文化－意識型態－再現的語言來討論。

Hershatter 的書中像這樣在提出具有洞見的議題之後，卻緊接著在視妓女為表意實踐的前提驅策下做出結論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整體而言，此書充滿精闢之見，但同時也錯失許多使妓女問題成為現代性中的一個問題 (*a problem in modernity*) 的討論機會，而僅止於討論關於現代性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結果卻有盲視之虞，亦即，無視於妓女與婦女可能扮演使文化主義與現代國族整合論述的持續生產受到頓挫的角色。在這方面，Hershatter 有意無意之間，也無法免於為了另一個更大的目的，而將婦女功能化的取向。

## 結論

現在讓我回到本文寫作時的架構，本文所評論的這兩部著作確實存在相當大的差異，Bray 的書幾乎只限於家庭範疇及顯然穩定的社會秩序中，而 Hershatter 的書儘管有其地域上的限制（上海），實際上廣泛地觸及了在歷史變遷中以商品形式呈現的性活動如何在家庭外的社會中存在。然而這兩本書卻提出許多有助於重新檢視中國研究領域目前對於延續性與一致性的歷史學方法論議題。先前歷史學上的偏見（尤其在中國史）是著重尋求

斷裂點，最常見於對前現代階段中的民變，或現代時期裡的工人罷工活動的重視。這種偏見無疑導致忽略了對日常生活、一般世俗的社會行為、性別關係（因為婦女鮮少出現在記載這類激烈的公共活動的文件中）、以及對傳統到現代的延續性等問題的研究。目前對於延續性與一致性的研究，開始時雖糾正了上述的偏見，現在卻又將歷史的觸角過度地伸向另一個方向。於是我們似乎只能找到一個極像過去我們所熟知的、在文化上統一、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一個有改變卻也未曾真正變化過的中國。